

DOI:10.3969/j.issn.1674-8131.2013.01.006

# 高等教育改革对居民消费和储蓄变化的影响\*

李天健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北京 100070)

**摘要:**作为消费品和投资品的高等教育发展是影响居民消费和储蓄变化的重要因素。1999年我国开始了以扩大招生规模和收取学杂费为主要内容的高等教育改革,结构突变检验表明,1999年我国高等教育招生规模发生了结构性突变,同时高等教育招生人数与居民年消费量以及高等教育招生人数与居民年终储蓄余额的协整关系也发生了变化。进一步的实证分析表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对居民消费及储蓄的影响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956—1965年挤出消费并拉动储蓄,1970—1998年拉动消费并挤出储蓄,1999—2010年挤出消费并拉动储蓄。由于高等教育学杂费增长超过收入增长、人们对于接受高等教育的渴望以及高等教育资源地域分布的不均衡,目前的高等教育改革不会在短期内扩大内需。必须在提高居民整体收入水平的基础上,才能通过高等教育的发展来有效扩大内需;同时,政府还应加大对高校的财政支持,减少高校收费,并加大对低收入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的扶持力度。

**关键词:**高等教育改革;扩招;学杂费;消费;储蓄;结构突变;扩大内需;人力资本投资;挤出效应;拉动效应

中图分类号:F08;G40-05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13)01-0045-09

## 一、引言

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是每一个家庭都关心的重要问题。随着我国人均GDP的增长,居民消费从物质消费逐渐转变为精神消费和劳务消费,对于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需求明显增长。大多数学者认为购买高等教育既是一种消费行为,也是一种投资行为(范先佐,1999;靳希斌,2002)。

作为投资品,高等教育是对未来消费的投资。一般说来,教育的投资成分具有持久性质,即长期生命力,人们投资它就像投资住宅一样,是为了从中获得未来的满足(舒尔茨,1991)。而高等教育的投资回报率也是相当可观的,20世纪90年代发达

国家高等教育的投资回报率达到12.3%,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更是高达20%,远远高于长期储蓄的利率,这也就解释了人们为什么都乐于投资高等教育。有关调查显示,我国居民希望自己的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达到了89.8%(宋潇竹等,2000)。

作为消费品,高等教育不同于其他的消费品,具有其自有的特点。在高等教育消费中,我们很难发现在其他消费决策中通常起决定作用的收入、价格等因素的影响,而更多的是偏离了收入、价格的影响而形成的非理性消费行为(陶美重等,2006),这种非理性会驱使消费者在高等教育消费中有着更多的盲目成分。

\* 收稿日期:2012-10-11;修回日期:2012-12-02

作者简介:李天健(1986—),男,河南郑州人;硕士研究生,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学习,主要从事宏观经济与城市经济研究。

作为消费品及投资品的高等教育,对居民消费及储蓄产生了三种不同的影响。首先,对于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居民及其家庭,其影响是拉动消费并挤出储蓄。其次,计划在未来接受高等教育的居民及家庭,会增加当期的储蓄,也就必然挤出当期的消费。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调查报告,在2004年,“攒教育费”是居民储蓄的首要动机;国家统计局对居民储蓄消费意愿抽样调查的结果也表明,居民储蓄的10%准备用于高等教育支出,而计划用于购房支出的不过7%(赵小玎等,2004);杨汝岱等(2009)也指出高等教育改革可能是导致我国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增强及消费不振的重要因素。最后,高等教育作为一种投资品,给其购买者及参与者带来了一系列未来的收益,无论这种收益是由于受了高等教育而使得未来职业收入增加,还是由于办了高等教育而使得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未来能为社会增加产品和服务量(陶美重,2007),都说明对高等教育的投资还会通过收入效应而增加未来的消费。

1999年我国高校开始大规模扩招,并收取学杂费。到2010年,我国高等教育招生人数达到662万人,比1998年增长了513%,年平均增长42.8%;高等教育支出由1998年的598亿元上升到2005年的2660亿元,增长了345%,这些支出除了国家拨付,其余主要依赖于学杂费收入,1998年高校的学杂费收入为73亿元,而2005年上涨到792亿元,增长了近10倍(杨汝岱等,2009)。这种高等教育改革必然对居民消费及储蓄产生重大影响<sup>①</sup>。从消费来看,扩大高校招生规模使更多的人进入高等院校,吸收了更多的居民消费。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家庭的教育支出以平均每年29.3%的速度增长(陶美重,2008);2001年我国在教育方面的消费达到了400亿美元,2004年更是达到了900亿美元,在消费榜上名列第二,这其中高等教育消费占据主要方面(孙艳,2008)。

从宏观数据看,1986—1998年,我国实际GDP由2.7万亿元增长到8.5万亿元<sup>②</sup>,增长215%;而

同期我国高等教育招生人数由57万人增长到108万人,增长89%。这说明在1999年高等教育改革之前,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远远滞后于国民经济的发展。1986—1998年我国居民消费从1530亿元增长到5258亿元,增长244%,年平均增长20.3%;而1998—2010年从5258亿元增长到8094亿元,增长54%,年平均增长仅为4.5%,不仅低于高等教育改革之前的增长率,而且也远远滞后于同时期高校招生人数的增长。而1998年到2010年我国城乡居民的储蓄额由7160亿元增长到18418亿元,增长157%,年平均增长13.1%,远远大于同时期居民消费的增长量<sup>③</sup>。

通过以上的数据分析可以看出,1999年高等教育招生规模扩大后,虽然招生人数增长了6倍之多,进而引发家庭的高等教育支出增长数倍,但是同时期居民消费的增长却远远地小于招生人数的增长,也小于城乡居民储蓄额的增长。而学界对于1999年高等教育改革对我国居民消费和储蓄的影响还有争论:一些研究结果表明,我国高等教育供给增长对消费需求的影响是正向的、显著的,也就是说,通过高校扩招可以有效地拉动内需(章晓英等,2010);而相反观点认为,高等教育支出对居民的消费具有显著的挤出效应,它使得有大学生的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下降了12%(杨汝岱等,2009),并且高等教育直接刺激消费的方式(扩大招生规模和提高学费)会对扩大内需产生较强的反作用(何雪莲等,2010)。

本文将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系统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高等教育发展对居民消费和储蓄的影响,并重点对1999年高等教育改革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以期能丰富相关研究,并为我国扩大内需和高等教育发展提供参考。

## 二、数据来源与经验观察

本文拟将高等教育招生规模对居民消费和储蓄的影响分别进行回归分析,居民年消费量和年终储蓄余额作为因变量,分别用C和S表示。本文所

<sup>①</sup>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高等教育改革会使得从事高等教育的教师及相关的行政人员增多,但是由于其收入限制并且与招生规模相比人数仍然较少(王志丰,2006),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远远小于招生规模扩大和学杂费上涨所带来的冲击,因此下文的分析对这一点不作考虑。

<sup>②</sup> GDP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为2000年不变价。

<sup>③</sup> 消费量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为1952年不变价。

用数据的时间跨度从1952年到2010年,这样可以有效地检验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年高等教育对居民消费和储蓄的影响及其变化,各数据均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2011》和《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原始数据见表1。其中城乡居民年消费额、城市居民年终储蓄余额及可支配收入均为1952年不变价。另外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响,1966—1969年我国高等教育并未进行招生。

表1 1952—2010年我国居民消费额、储蓄额、实际可支配收入和高校招生人数

年份	消费额 /亿元	储蓄额 /亿元	实际可支配 收入/亿元	高校招生 人数/万人
1952	453.00	8.60	594.51	7.9
1953	492.28	11.44	664.77	8.1
1954	508.79	14.71	690.21	9.2
1955	521.73	17.23	699.09	9.8
1956	533.22	22.01	736.46	18.5
1957	551.49	28.27	760.65	10.6
1958	572.33	43.64	872.60	26.5
1959	595.86	58.88	1 074.65	27.4
1960	674.89	60.33	1 186.85	32.3
1961	792.91	53.79	1 083.92	16.9
1962	785.30	38.48	949.75	10.7
1963	722.77	39.13	966.43	13.3
1964	720.91	44.98	1 020.91	14.7
1965	702.73	48.15	1 052.36	16.4
1970	809.39	53.32	1 291.62	4.2
1971	835.21	59.76	1 376.53	4.2
1972	859.11	67.74	1 375.90	13.4
1973	881.00	74.54	1 427.21	15.0
1974	903.33	83.99	1 464.47	16.5
1975	920.78	90.18	1 534.72	19.1
1976	937.17	93.86	1 510.53	21.7
1977	959.70	105.77	1 571.19	27.3
1978	984.39	117.85	1 727.10	40.2
1979	1 052.97	147.10	1 860.85	27.5
1980	1 119.57	190.08	1 931.20	28.1
1981	1 165.34	232.10	1 941.82	27.9
1982	1 205.32	280.44	2 030.39	31.5

续表

年份	消费额 /亿元	储蓄额 /亿元	实际可支配 收入/亿元	高校招生 人数/万人
1983	1 241.07	342.96	2 089.75	39.1
1984	1 283.31	416.58	2 200.13	47.5
1985	1 416.33	490.28	2 125.95	61.9
1986	1 530.15	645.81	2 429.31	57.2
1987	1 667.87	839.48	2 759.88	61.7
1988	1 987.15	964.54	3 282.78	67.0
1989	2 230.15	1 312.01	3 690.66	59.7
1990	2 306.35	1 737.43	4 032.90	60.9
1991	2 411.27	2 077.42	4 401.44	62.0
1992	2 578.33	2 331.84	4 813.17	75.4
1993	3 002.80	2 781.67	5 979.73	92.4
1994	3 820.91	3 763.99	7 887.07	90.0
1995	4 603.27	4 813.01	9 277.85	92.6
1996	5 036.28	5 713.34	9 974.96	96.6
1997	5 240.32	6 568.55	10 421.23	100.0
1998	5 257.66	7 157.88	10 355.87	108.4
1999	5 187.75	7 378.34	9 954.95	159.7
2000	5 225.25	7 330.84	9 819.00	220.6
2001	5 305.55	7 952.14	10 098.44	268.3
2002	5 321.67	8 797.76	10 397.49	320.5
2003	5 402.08	9 848.81	11 062.00	382.2
2004	5 649.29	10 580.71	12 046.22	447.3
2005	5 841.32	11 569.12	13 116.24	504.5
2006	6 022.61	12 092.63	13 982.97	546.1
2007	6 356.55	11 716.75	14 768.45	565.9
2008	6 753.10	13 574.80	15 739.85	607.7
2009	7 599.89	16 361.25	17 994.00	639.5
2010	8 094.00	18 417.83	19 498.39	661.8

1952—2010年我国城乡居民消费额、年终储蓄额及高等教育招生人数的变动情况如图1所示。由图1可以看出:1952—2010年我国城镇居民年消费额、年终储蓄余额及高等教育招生人数并不是持续的增长,都在个别年份出现过负增长的情况;高等教育招生人数的波动最大,最高的增长率达到了90%,而最低为负增长40%,相比而言,居民年消费额的波动较小,居民年终储蓄余额的波动居中。我们发现,从图1很难看出高等教

育改革是否造成招生人数的结构性变化,同时也无法看出高等教育改革对城乡居民年消费额及年终储蓄余额的影响究竟如何。因此,有必要对我

国高等教育招生人数的结构性变化及高等教育对城乡居民年消费额及年终储蓄余额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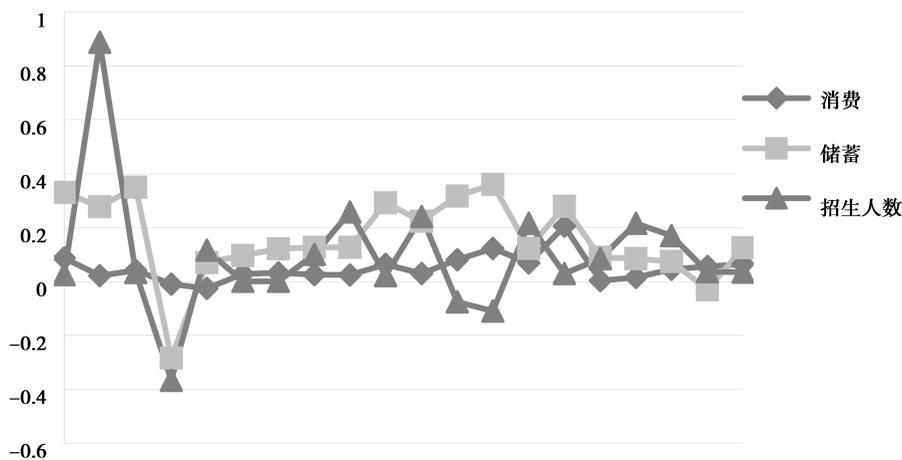


图1 1952—2010年我国居民消费、储蓄及高等教育招生人数的长率

### 三、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变结构点检验

在研究高等教育改革对居民消费和储蓄的影响时,虽然可以将1999年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开始年份作为天然的分界点,但是这样做缺乏实证依据,因为无法肯定1999年后我国的高等教育招生规模是否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所以本文运用结构突变<sup>①</sup>来检验1999年前后我国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变化<sup>②</sup>。用 $NHEE$ 表示高等教育招生人数,并对其取对数,形成新的序列 $LNNHEE$ ;选用Banerjee等(1992)提出的循序检验法来检验 $LNNHEE$ 序列的结构突变。根据该方法,通常选取的检验范围为 $k = [0.15T, 0.85T]$ ,其中 $T$ 表示样本数,在此范围内利用虚拟变量循序检验结构突变发生的年份,其检验式为:

$$\Delta LNNHEE_t = \rho LNNHEE_{t-1} + \mu + \alpha t + \beta \Delta LNNHEE_{t-1} + \gamma D_t + u_t$$

$$u_t \sim \text{IID}(0, \sigma^2)$$

从检验得到的ADF值序列中选择最小值,同相应的临界值比较,检验单位根零假设,其中虚拟变量 $D_t$ 分两种情况。

情况1为均值突变型:

$$D_t = \begin{cases} 0 & t \leq k \\ 1 & t > k \end{cases}$$

情况2为趋势突变型:

$$D_t = \begin{cases} 0 & t \leq k \\ t - k & t > k \end{cases}$$

如果检验结果发现在1999年我国高等教育招生人数确实出现了结构性的变化,那么便可以据此将1999年作为分界点来分析其前后不同的影响。

在进行结构突变检验之前需要确定各变量之间具有协整关系。首先分别对1970—2010年高等教育招生人数与居民年消费量以及居民年终储蓄余额这两组关系进行协整检验。为了消除数据中异方差的影响,对 $NHEE$ 、 $C$ 及 $S$ 数据序列进行取对

① 已有的实证结果证明,大多数时间序列是非平稳的,不仅如此,在现实的经济系统中,由于受到各种外生影响的冲击,如政策变动,可能造成数据生成过程(DGP)中的时变性问题,即DGP的结构突变。正是基于这一点,Perron(1989)提出结构突变的单位根问题,并运用结构变化的单位根检验,发现美国宏观经济变量时间序列数据大部分为结构突变的趋势稳定。这种现象被称为“Perron现象”。

② 由于缺乏关于高等教育学杂费的相关统计数据,并且在1999年之前很长时间内我国高等教育基本不收取或只收取很少的学杂费,不对居民的消费和储蓄造成显著影响,而1999年之后上涨迅速(刘民权,2006),可以将1999年作为学杂费变化的天然分界点。因此,本文不对学杂费进行结构突变检验。

数变换,新变量记为  $LNNHEE$ 、 $LNC$  及  $LNS$ 。

首先,依据 AIC 准则对序列  $LNC$ 、 $LNS$  及  $LNNHEE$  进行 ADF 检验,检验结果见表 2。检验结果表明, $LNC$ 、 $LNS$  及  $LNNHEE$  的水平值序列均不平稳,而经过一阶差分后均为平稳序列,同为一阶单整序列,可以进行协整分析。

根据 EG 两步法,对  $LNC$  和  $LNNHEE$  进行 OLS 回归,得到残差  $e_1$ ;对  $LNS$  和  $LNNHEE$  进行 OLS 回归,得到残差  $e_2$ ,并根据 AIC 准则对这两个残差序列进行 ADF 检验,结果见表 3。

表 2 序列  $LNC$ 、 $LNS$  及  $LNNHEE$  的 ADF 检验结果

序列	ADF 检验值	临界值			结论
		1%	5%	10%	
$LNC$	-0.41	-3.61	-2.94	-2.61	不平稳
$LNS$	-1.09	-3.61	-2.94	-2.61	不平稳
$LNNHEE$	-1.64	-3.61	-2.94	-2.61	不平稳
$\Delta LNC$	-3.51	-3.62	-2.94	-2.61	** 平稳
$\Delta LNS$	-2.89	-3.61	-2.94	-2.61	* 平稳
$\Delta LNNHEE$	-6.21	-3.61	-2.94	-2.61	*** 平稳

注: $\Delta$  表示一阶差分。

表 3 残差序列的 ADF 检验结果

序列	ADF 检验值	临界值			结论
		1%	5%	10%	
$e_1$	-2.56	-2.63	-1.95	-1.61	** 平稳
$e_2$	-2.17	-2.63	-1.95	-1.62	** 平稳

从结果来看,残差  $e_1$  和  $e_2$  的 ADF 检验值都小于显著性水平为 5% 的临界值,同为  $I(0)$  序列。序列  $LNC$  和  $LNNHEE$  是  $(1,1)$  阶协整,序列  $LNS$  和  $LNNHEE$  也是  $(1,1)$  阶协整。

由此便可以对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数据生成进行结构突变检验,本文采用循序检验法,运用 EViews6 进行编程对序列  $LNNHEE$  进行检验。检验结果显示,1970—2010 年我国的高等教育招生人数出现了均值突变,但并未出现趋势突变,变结构点恰恰就出现在 1999 年,这正好与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时间相吻合,结果见图 2。这说明在 1999 年之后,我国高等教育招生人数与居民年消费量以及高等教育招生人数与居民年终储蓄余额的协整关系都发生了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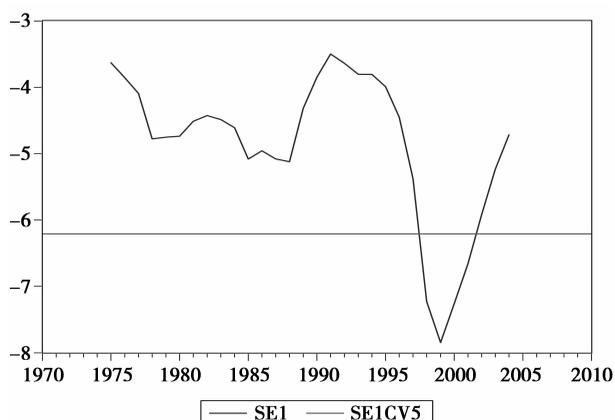


图 2  $LNNHEE$  序列 5% 临界值下的均值突变

#### 四、高等教育改革对居民消费和储蓄的影响

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主要表现为招生规模扩大和收费上涨。虽然招生规模在 1999 年之前已经开始有了一定幅度的上涨,但招生人数的变结构点出现在 1999 年。同时,收取学杂费是在 1999 年全面铺开,之前学杂费几乎为 0,并且缺少关于学杂费的统计资料,所以本文以虚拟变量  $D$  来表示收取学杂费的影响,取值为:

$$D = \begin{cases} 0 & t < 1999 \\ 1 & t \geq 1999 \end{cases}$$

同时在模型中引入高等教育招生人数和学杂费的交叉项作为自变量,以此来综合检验高等教育改革对于居民消费和储蓄的影响,将其表示为  $D \times NHEE$ 。由于影响居民消费及储蓄的主要因素为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所以模型中引入实际可支配收入作为控制变量。将名义支出法得到的国内生产总值减去名义税收总额,再根据基期的价格进行标准化,得到实际可支配收入(李子奈等,2010),记为  $RDI$ 。构建模型:

$$C = c_1 + \alpha_1 NHEE + \beta_1 D + \gamma_1 (D \times NHEE) + \omega_1 RDI + \varepsilon_1 \quad (1)$$

$$S = c_2 + \alpha_2 NHEE + \beta_2 D + \gamma_2 (D \times NHEE) + \omega_2 RDI + \varepsilon_2 \quad (2)$$

##### 1. 1952—1965 年的实证检验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我国在 1966 年至 1969 年这四年间的高等教育招生人数为 0,所以本文将数据分为 1952 年—1965 年和 1970 年—2010 年两段,并且首先对 1952—1965 年的数据进行实证

检验。这段时期,我国高等教育不收取任何学杂费,而且对每个学生都有一定的补贴(晏成步,2011),所以不考虑学杂费的影响,将可支配收入作为控制变量,其模型为:

$$C = c_1 + \alpha_1 \times NHEE + \omega_1 \times RDI + \varepsilon_1 \quad (3)$$

$$S = c_2 + \alpha_2 \times NHEE + \omega_2 \times RDI + \varepsilon_2 \quad (4)$$

运用 EViews6 对模型(3)和(4)分别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

表4 1952—1965年的回归分析结果

	居民年消费量	居民年终储蓄余额
高等教育招生人数	-90 069.71(-4.20*)	4 516.98(2.70*)
可支配收入	0.75(8.53*)	0.08(11.42*)
F 统计量	39.14*	173.47*
Adj R - squared	0.85	0.96

注:括号内为t统计检验量,\*表示p<0.05。

从回归分析的结果来看,1952—1965年我国高等教育招生人数对居民年消费量与年终储蓄余额有着显著的影响。高等教育招生人数与居民年消费量成反比,每多招收一人接受高等教育,全国居民年消费量就会下降90 069.71元;而与居民年终储蓄余额成正比,每多招收一个人接受高等教育,全国居民年终储蓄余额就会增长4 516.98元。可以看出,在当时,高等教育挤出了居民的消费,而提高了储蓄。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由于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高等教育事业需要大量的投资,且基本上是由国家来完成,而这种投资挤出了一部分居民消费;另一方面是由于当时的高等教育不收费,且一旦接受高等教育意味着将来能够得到可观的收入,所以居民有着较大的意愿为了接受高等教育而进行储蓄。

## 2. 1970—2010年的实证检验

首先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用AIC准则检验,结果见表5。从表5中可以看出,1970—2010年我国居民年消费量、居民年终储蓄余额和高等教育招生人数都为非平稳序列,一阶差分序列均为平稳序列。

由于高等教育招生人数的结构突变点出现在1999年,可以依据模型(1)和(2)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6。

从回归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在显著性水平为5%时,除了学杂费对居民年终储蓄余额的影响不显著外,其余变量都对因变量有着显著的影响。具体来看,在高等教育改革前,其招生人数

与居民年消费量成正相关,每多招收一名,居民年消费量增加49 441.98元;而高等教育改革后,招生人数与居民年消费量成反比,每多招收一名学生,居民年消费量减少76 368.56元。对于居民年终储蓄余额来说,高等教育改革前,高等教育招生人数与其成反比,每多招收一名学生,储蓄余额下降107 000.7元;而改革后,双方的关系却呈现正相关,每多招生一名学生,储蓄余额增加152 235.6元。

表5 1970—2010年各项数据的单位根检验

变量	ADF 检验值	显著水平		
		1%	5%	10%
C	0.97	-3.61	-2.94	-2.60
$\Delta C$	-3.00	-3.62	-2.94	-2.61
S	2.66	-3.61	-2.94	-2.61
$\Delta S$	-4.93	-4.22	-3.53	-3.20
NHEE	-1.11	-4.21	-3.53	-3.20
$\Delta NHEE$	-4.17	-3.61	-2.93	-2.60

注: $\Delta$ 表示一阶差分。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对高等教育招生人数与居民年消费量的关系及其与居民年终储蓄余额的关系进行格兰杰因果分析,检验结果见表7。从表7中可以看出,在1970—2010年,我国高等教育的招生人数的变化是居民年消费量及居民年终储蓄余额变化的原因。

表6 1970—2010年的回归分析结果

	居民年消费量	居民年终储蓄余额
高等教育招生人数	49 441.98(4.36 <sup>*</sup> )	-107 000.7(-2.08 <sup>*</sup> )
学杂费(虚拟变量)	1.41E+11(12.95 <sup>*</sup> )	-4.27E+10(-0.87)
学杂费×高等教育招生人数	-76 368.56(-7.80 <sup>*</sup> )	152 235.6(3.43 <sup>*</sup> )
可支配收入	0.43(37.66 <sup>*</sup> )	0.81(15.64 <sup>*</sup> )
F 统计量	5 944.04 <sup>*</sup>	1 491.62 <sup>*</sup>
Adj R-squared	0.99	0.99

注:括号内为t统计检验量,\*表示 $p < 0.05$ 。

表7 1970—2010年各项数据之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假设	滞后阶数	Obs	F 值	P 值
高等教育招生人数不是居民年消费量的原因	2	39	2.742 13	0.078 7
高等教育招生人数不是居民年终储蓄余额的原因	2	39	2.339 56	0.071 3

#### 四、结论与讨论

1999年,我国进行了以扩大招生规模和提高学杂费为主要内容的高等教育改革,其对我国居民的消费和储蓄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在学术界一直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本文的实证分析表明,我国高等教育招生人数的变化是居民年消费量及居民年终储蓄余额变化的原因之一,而且在1999年高等教育改革前后,招生人数与居民年消费量以及招生人数与居民年终储蓄余额的协整关系都发生了变化。进一步的分析表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对居民消费及储蓄的同影响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1952—1965年,我国高等教育招生人数的增加挤出消费并拉动储蓄;(2)1970—1998年,高等教育招生人数的增加拉动消费并挤出储蓄;(3)1999年以后,高等教育的发展挤出消费并拉动储蓄,并且对储蓄的拉动效应明显大于对消费的挤出效应,前者是后者的大约2倍。可见,只有在1970—1998年,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才真正地拉动了居民消费。

1999年,我国实行高等教育改革的目的是主要有两点,一是提高人力资本,二是扩大内需,最终都是为了促进经济的增长(张志刚,2009)。而本文的实证研究表明,高等教育改革并未能有效地扩大内需,反而使得高等教育对于居民消费由之前的拉动效应变为挤出效应,对于居民储蓄则由挤出效应变

为拉动效应。高等教育改革对于居民消费和储蓄的这种影响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

一是高等教育学杂费增长超过收入增长。高等教育改革后,学杂费大幅上涨,而且其增长速度超过了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自2000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学杂费占GDP的比重已经明显高于发达国家的水平(王喜林等,2008),目前学杂费与人均纯收入已经非常接近,如果再上涨便会超过一般家庭的承受能力。同时,由于招生规模的扩大,更多的家庭即将负担一个或更多的学生去接受高等教育,并且常常是用全家的收入去负担一个大学生的花费。这些都说明我国现阶段的居民收入增长还不能消化高等教育学杂费的快速增长,而人们对高等教育的刚性需求导致其减少对其他项目的消费,以保证其对当前或未来高等教育的消费支出。

二是人们对于接受高等教育的渴望。首先,无论是低收入者还是高收入者都试图让子女接受良好的教育,这必然加重家庭的负担(薛进军等,2011)。而且越是低收入的家庭越是渴望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来改变低收入的窘境,从而将其本就不多的收入更多地用于对高等教育的消费和储蓄,挤占了更多的对其他商品或服务的消费,这种情况在农村家庭表现得尤其明显。其次,1978年我国恢复高

考后,有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高等教育,这些人对其子女的要求也相应地提高,相关研究表明父母受教育年数和子女受教育年数之间呈正相关(薛进军等,2011)。最后,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城市中,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希望以高等教育为跳板进入城市生活,导致城市化速率远低于大学生就业供给的增长率(李彬,2011),而这些大学生在城市生活还会面临住房等一系列问题,预防性储蓄不可避免地会增加。无论渴望接受高等教育的原因是什么,归根结底也是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能够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来增加接受高等教育者的预期收入。但是由于这一收入效应在短时期并不会对消费产生影响,并且我国现阶段的收入分配更多地向资本所有者倾斜,劳动报酬所占比重不断下降,高校招生规模的扩大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高学历人才的贬值,高等教育改革不仅没能优化产业结构,反而加剧了失业问题(何雪莲等,2010),这就造成了一种收入上的恶性循环。可见,我国现阶段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具有一定的盲目性,而1999年的高等教育改革对这种盲目性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是我国高等教育资源在地域上分布的不均衡与人均收入在地域上分布的不均衡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耦合性。高等教育资源多集中分布于东部地区,而西部地区较为匮乏,这恰恰与我国人均收入所呈现出的东高西低的状况相一致。这种状况将导致低收入地区的学生有更大的可能性去往高收入地区接受高等教育,从而使其接受高等教育相关的支出与其收入不平衡,导致其家庭更多地减少对其他项目的消费并增加预防性储蓄。

总之,在人们急切渴望自己或后代接受高等教育的大背景下,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极大地刺激了高等教育需求,而学杂费不断上涨与居民收入增长缓慢的矛盾导致了高等教育扩招挤出消费而拉动储蓄的经济效应。因此,现阶段扩大高等教育招生规模及增加学杂费并不能在短期内拉动居民消费,必须在提高居民整体收入水平的基础上,才能通过高等教育的发展来有效扩大内需。同时,学杂费的上涨只会导致预防性储蓄的增加,政府不应任由学杂费不停地上涨,应加大对高校的财政支持,减少高校收费,进而降低居民为接受高等教育而进行的

储蓄,使居民能拿出更多的收入去消费其他的商品和服务。此外,还应逐渐减小高等教育资源在地域分布上的差异,加大对低收入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的扶持力度。

#### 参考文献:

- 范先佐.1999.教育经济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 何雪莲,刘婷.2010.扩大内需:高等教育之困[J].现代大学教育(2):44-112.
- 靳希斌.2002.教育资本:规范与运作[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
- 李彬.2011.中国高校规模扩张与大学生城镇就业问题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6):27-37.
- 李子奈,潘文卿.2010.计量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 刘民权,俞建拖,李鹏飞.2006.学费上涨与高等教育机会公平问题分析[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4(2):47-61.
- 宋潇竹,解蓉.2000.教育是扩大内需的重要途径[J].求是学刊(4):64-67.
- 舒尔茨.1991.经济增长与农业[M].中译本.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 孙艳.2008.个人高等教育消费行为研究[D].武汉:华中农业大学.
- 陶美重,强侠.2006.个人高等教育的经济学分析[J].湖北社会科学(6):156-160.
- 陶美重.2007.高等教育消费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
- 陶美重.2008.我国居民高等教育消费现状分析[J].黑龙江高教研究(3):9-12.
- 王德文.2003.教育在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转型中的作用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1):22-31.
- 王喜林,刘丽红.2008.论我国高等教育学费标准[J].现代经济,7(8):145-146.
- 王志丰.2006.我国高校教师人力资本价值实现研究[D].厦门:厦门大学.
- 薛进军,高晓淳.2011.再论教育对收入增长与分配的影响[J].中国人口科学(2):2-12.
- 晏成步.2011.关于高校收费问题的实证分析[J].教育发展研究(19):8-13.
- 杨汝岱,陈斌开.2009.高等教育改革、预防性储蓄与居民消费行为[J].经济研究(8):113-124.
- 张晓峒.2007.EViews使用指南与案例[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94-300.
- 张志刚.2009.高等教育区域优化研究[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
- 赵小玗,孙辉.2004.论发展教育对扩大内需的作用及应注意

的问题[J]. 云南财贸学院学报(2):43-46.  
BANERJEE A, LUMSDAINE R L. 1992. Recursive and sequential tests of the unit root and trend break hypothesis,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evidence[J].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Economic Statistics, 10:271-287.

PERRON P. 1989. The great crash, the oil-price shock and the unit-root hypothesis [J]. Econometrica, 57:1361-1401.  
ZIVOT E, ANDREWS D. 1992. Further evidence on the great crash, the oil-price shock and the unit-root hypothesis [J].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Economic Statistics, 10:251-270.

## The Impact of Higher Education Reform on the Change of Consumption and Savings of Chinese Residents

LI Tian-jian

(School of Urban Economy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Trade, Beijing 100070, 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as a consumption product and an investment product, is an important factor to affect the change of consumption and savings of Chinese residents, in 1999, China began to reform higher education by enlarging enrollment scale and by collecting tuition fees and incidental fees as main contents of the reform, and unit root method test shows that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enrollment scale in 1999 underwent structural break, meanwhile, the cointegration relation between the enrollment number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consumption quantity of Chinese residents and between the enrollment number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balance of yearend consumption of Chinese residents also changed. Further empirical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impact of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on the consumption and savings of Chinese residents can be approximately categorized into such three periods as squeezing out consumption and driving savings during 1956—1965, driving consumption and squeezing out savings during 1970—1998 and squeezing out consumption and driving savings during 1999—2010. Because the increase of tuition fees and incidental fees of higher education surpassed the increase of income growth of Chinese residents, because Chinese youths are desired to obtain higher education and because higher education resources allocation is not balanced, current higher education reform can not expand domestic demand in short-term, as a result, the overall income level of Chinese residents must be raised so that domestic demand can be effectively enlarged by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meanwhile, Chinese Government should consolidate financial support for higher learning institutions, reduce tuition fees and incidental fees of the institutions and enhance the support for the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in the areas with the residents with low income.

**Key words:** higher education reform; enrollment enlargement; tuition fees and incidental fees; consumption; savings; structural break; domestic demand enlargement;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squeezing out effect; driving effect

**CLC number:** F08; G40-054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674-8131(2013)01-0045-09

(编辑:夏 冬)